

蒋介石与希特勒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马振犊 戚如高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蒋介石与希特勒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马振犊 戚如高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
马振犊，戚如高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08-1398-6

I. ①蒋… II. ①马… ②戚… III. ①中德关系—国
际关系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D82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8552号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作 者 马振犊 戚如高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7.75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98-6
定 价 4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民国时期的中德外交关系，是我国近代对外关系中十分重要而又颇具特色的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自 1927 年建立起，直至 1941 年对德断交以后数年之内，与德国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政府之间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尤其在 1933 年纳粹党上台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与第三帝国之间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曾保持了十分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从希特勒、蒋介石直至双方所属军政大员之间都有密切友好的私人交往，德国通过其驻华军事经济顾问及德国政府在华代表，沟通了中德间军事、经济贸易的密切合作。德国政府在国民政府“攘外”与“安内”的军事建设以及军工、交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影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而中国则以大量的战略原料供应德方，在其重建经济及重整军备方面，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中德双方在这种合作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中德间的此种合作，有出自政治上的基本因素。其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纳粹组织及铁腕独裁统治方式的极端推崇与效仿；其二是当时中德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在思想及心理上产生了共鸣。虽然两国的具体环境及发展基础并不相同，而且，纳粹党人从其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出发，对中国这个远东弱国的歧视心理并未消除，德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希特勒出于对华战略原料输入及其全球策略之考虑，在 1941 年以前，德方的对华友好与合作方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愿看到中日两国交战而对其全球霸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希望日本侵华得利即止，最好能联合中国共同反苏反共，配合德方的全球战略，因而就有了 1938 年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之举。

“调停工作”失败以后，德国被迫在中日之间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选择。最后，希特勒从其世界战略需要出发，在日方的压力及要挟之下，终于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中国。1938年7月，德国政府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团。1941年7月1日，中德断交，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对德宣战。然而由于地理等客观因素，中德两国并没有直接交战，更因国民政府与纳粹政权之间并没有什么大宿怨，故而双方在断交宣战之后依旧保持了一定的秘密接触，国民政府对留华德侨之遣送与安置都给予了照顾，而德国与汪伪政权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愉快，重庆与柏林之间实际上保持了一种“面不和心和”的关系。

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在二战后期竟然通过在美国的宋子文和在德国做暗中联系人的齐峻渠道，向德国内部克兰、托马思等反希特勒势力提供了经济支持，资助他们推翻纳粹政权的活动，希望亲华派上台以恢复中德关系。虽未成功，但却成为中德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

战争结束后，纳粹政权灭亡，中国政府显要人物对于一些有“交情”的流亡在华的前纳粹分子，给予了一些庇护。而德方战前与中国合作过的人物，如法肯豪森、克兰等人中方上层人物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信使往来，这种关系甚至一直持续到国民党人退据台湾之后。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主要是指纳粹德国）的关系是民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其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战前的中德关系实可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只不过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等诸多原因及后来的战争关系，中德间的这种友好往来基本处于较为秘密的状态，鲜为人知。

1987年及1988年，两位民主德国的历史学者曾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部分中德关系档案资料，揭开了我们利用这部分档案进行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的序幕。其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与原东柏林洪堡大学及西柏林自由大学之间就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研究项目的专题合作正式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搜集整理，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中德关系密档中之重要文件汇编成《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并于199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其他新发现及尚未发现之资料，仍待进一步发掘整理。

在编纂《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大量的有关本专题的档案资料，并由此产生了对于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关系史

的研究兴趣。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在编研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广泛搜集了保存在德国及台湾的有关中德关系资料，在德国及台湾地区学者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得以集三方资料于一地，为从事中德关系史写作及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本书大略具有以下几方面之特点：

其一：资料翔实、全面，在目前可能的范围内已尽量搜集了能够查证引用的资料，尤其是来自海峡两岸的档案史料，这便使书稿具有了独特的优势，再加上德方外交档案之补充校正，使书稿论据更充分、确实。在引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方面，基本皆出自于《中德外交密档(1927 ~ 1947)》一书。

其二：就本专题研究而言，现在国内外学界专门研究此期中德关系之专著并不是很多，过去对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有其成名之著《德国与中华民国》一书面世，但其主要资料来源，为德文档案资料及美国所存有关情报资料，缺少中文档案为其补充；而在德国方面，以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中心，延揽多位学者进行了有关中德关系的研究计划，已陆续将中德双边的有关历史资料整理出版；在海峡彼岸，台湾方面在其“总统府机要档案”等藏档中保存有中德关系许多重要文件，其中大部分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中所缺乏者，台湾史学界有数位已在这一专题研究上有建树的专家，如李思涵教授、傅宝真教授、周惠民教授以及曾经参加过中德外交的一些历史见证人。他们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德关系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贡献良多。在大陆学界也有吴景平教授、陈仁霞博士等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各自出版了高质量的专著。而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上述诸位的研究成果，可视为是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其三：不避艰难，曲径探幽，尽力揭示中德关系之谜底是本书又一大特色。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其相当一部分史实并无文字记载，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德日三角之间复杂的互为敌友关系，使中德间交往许多事实经过处于地下状态，既不见诸报刊杂志，也不记载于正史档案，这种隐形历史给今天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中德关系的历史对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当时国际关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故绝不可忽略不计。我们在撰写书稿时，从档案正史到口述历史、文史资料，举凡有关中德关系资料无不费尽心机搜罗而来，争取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穷中德关系之前

因后果，溯其史事之来龙去脉，其中对于“中德易货贸易”、“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活动”、“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之中国观”等重点研究课题进行了详细研讨，力求供给读者们尽可能多的新鲜“食粮”，使人们对于民国外交史上这重要而隐秘的一页有一个初步的整体印象，进而使他们对民国历史上许多有关疑题有一崭新的理解。如果读者们在阅览之后有所收获，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有以教正，则更是我们所期盼的。

2007年9月9日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希特勒的远东崇拜者

国民党人对德国的友好渊源	4
纳粹幽灵在德国大地徘徊	11
蒋介石对纳粹的崇拜与效仿	18

第二章 中德关系的新篇章

邦交初建.....	39
蒋介石与他“唯一的欧洲朋友”鲍尔	46
过渡型的总顾问克里拜尔	62
中德工贸合作之开始	68
德国军火与中国内战	78

第三章 发展中的中德关系

希特勒掌握德国统治权	91
神秘商人克兰与其来华使命	94
德国顾问参加中国内战	107

江西前线德国人的较量	118
劳而无功的德国将军	125

第四章 中德关系渐趋密切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	143
德国“国防军之父”访问中国	159
塞克特、克兰与“中德易货协定”	172
德国马克与中国工业国防	184
德国与中国“两广”地方的合作	204
日本的干涉	214

第五章 并非正义的支援

中国代表团赴德	241
“广东风波”之后的贷款协定	250
德国顾问与中国抗日战备	266
物超所值的军火贸易	283
希特勒会见中国特使	295

第六章 尴尬的第三者

德国人左右为难	313
陶德曼调停的前因后果	322
德国顾问在抗日前线	333
永远的拉贝	342
由明变暗的军火贸易	355

第七章 友好末途

大势将去	377
最后的晚餐	387
“政治是不讲信誉和良心的”	399

第八章 中德断交与宣战

中德断交与中国对德宣战	409
蒋介石资助推翻希特勒的行动	416
纳粹德国与汪伪政权的关系	420
战后中德复交的努力	428

附 录

人名表	437
-----------	-----

希特勒的远东崇拜者 | 第一章

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日前线，德式装备的中国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官兵，在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向盘踞在虹口地区的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爆发。

经过正规训练的中国士兵们头戴德式宽沿钢盔，手持德制步枪，身后有德国火炮的支援，他们在马克沁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日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此时，在中方司令部及各前线指挥所内，有一批高鼻凹目的外国军人，正在紧张地协助中国军官们指挥作战。他们就是来自遥远欧洲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总人数曾达71人之多，其负责人为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四年后，他回到欧洲战场，担任了德军驻比利时及北法地区陆空军总司令。

与此同时，在中国内地江西山间，挥汗如雨的矿工们正辛苦地劳作着，一车车稀有矿产钨砂，正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运往广州、香港，装上巨轮，驶向德国。

身陷侵略战火浴血奋战中的中国，正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进行着重要的秘密交易……

七年之后。

1945年4月30日，德国首都柏林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

总理府花园地下室暗堡内，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那位曾经使整个世界为之颤抖的战争狂人、德国元首兼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绝望地倒在血泊中，他用手枪和毒药双管齐下地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几天后，纳粹德国宣布战败投降。

一个星期以后，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

国民政府大礼堂内张灯结彩，一片热烈欢庆景象。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正高举酒杯，向驻华英美苏军事将领及外交官们祝贺打败纳粹及欧战胜利结束。

面对如此热烈场面，有谁又会想到，仅仅数年以前，蒋介石与希特勒，这两位“二战”名人、世界上两大对垒阵营的指挥者之间，还曾有过十分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交驰，互致“倾仰”、“关切”之情，更有互赠照片、战刀、座车，“以表袍泽精神，亲善正意”，“猥荷荣宠，欣感无既”^[1]。

那么，这一惊人的变化是如何戏剧般地出现的呢？蒋介石与希特勒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欲彻底弄清其中谜底，事情还得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对德方针及国民政府肇建之初的对德关系谈起。

国民党人对德国的友好渊源

中德两国最早的正式交往始于1752年，第一艘来自德国的商船“普鲁士国王号”经过长途远航抵达广州，开始了中德双边商贸往来的历史。当时，德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由各大小邦国组成的国家。德国人最早是从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纪》中得知中国这个远东古国的存在的。经过历代传教士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德国，引起了德国人浓厚的兴趣。在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及文学家、诗人歌德的作品中，都有关于中国的描述与评论。当时普鲁士王公贵族都以拥有中国的产品为自豪。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中国这个远方古老国家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充满了东方神秘的意味。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对西方列强敞开大门，中德关系也融入了清末不平等的外交大局中，德国效仿英法列强，以枪炮打入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殖民利益，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双边不平等条约。

1871年，德国完成了内部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全力支持向海外扩展德国势力，德国联合俄、法参与了甲午中日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并进一步武力侵占了中国山东胶州湾，对中国进行侵略与

蚕食。1900年德军元帅瓦德西（Waldersee）又担任了“八国联军”总司令，指挥德军等侵略军队到中国杀人放火。战后，德国还从《辛丑条约》中向中国勒索了1.966亿两白银的“战费赔偿”。这时的德国已成为一个十足的西方侵略者。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德国与西方列强“保持一致”，支持袁世凯篡夺了政权。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联合意大利、奥地利对英法俄开战。北京政府宣布“严守中立”，但德国在山东之资产利益不久即被日本趁机攫取。

袁世凯称帝不成病死，他的后继者国务总理段祺瑞于1917年3月在英法等国的挑唆下对德绝交，并进而于8月14日对德宣战。这是中德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宣战。次年11月，德奥战败投降，然而在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地位不仅没有“收回国权”，反而又被“战胜国”列强欺辱，将德国在山东特权正式移交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摇摇欲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成立了“魏玛（Weimar）共和国”政府^[2]。这时的德国已经沦为一个战败国，失去了全部的海外殖民地，经济百孔千疮，社会动荡不安，各战胜国通过“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套上了一副副政治、经济、外交枷锁。客观现实摆在德国人面前，他们已失去了列强之一的优越地位。

魏玛共和政府为了打破困境，急于恢复外交地位，在中德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了主动的步骤。1920年，德国政府派代表卜尔熙（Borch）来华开展活动，试图与德国在远东的重点对象——古老而拥有广大市场的中国恢复商贸往来，为拯救战后德国千疮百孔的经济创造条件。卜尔熙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声明：德国政府愿意“恢复中德之友谊及通商关系，因此项关系应基于完全平等及真切相互之主义，合于普通国际法之条规者”^[3]。他声明：德政府“允许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抛弃德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使署所属之全部权利于中国……”。

1921年7月1日，中德双方在北京举行了新签《中德协约》换文仪式，这份文件宣告：“大中华民国政府、大德意志共和国政府，意愿以本日大德意志共和国声明文件为依据，两国订立协约，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并觉悟领土主权之尊重与夫平等相互各种原则之实行为维持各民族间睦谊之唯一方法。”^[4]这份协约是中德关系史上第一个平等的条约，标志着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正式恢复。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是：除了盘踞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外，在广州还有一直领导着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南方革命政权。

孙中山先生在其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及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中，也形成了一套代表革命党人的外交理论及方针。孙中山认为，为了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尽可能地争取西方强国的援助，而在列强各国之中，德国便是其谋求外援的重点对象之一。当时孙中山“认为可作中国之友者，应为美国与日本，其次即为德国”^[5]。

早在1913年，孙中山就曾提出过一种创建“大陆同盟”区域组织的设想，他计划以中、俄、德、奥、土（土耳其）、波（兰）六国为核心成立联盟，以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2月间，孙中山在日本访问时，曾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此一设想，并曾计划派其秘书戴季陶为代表，赴欧联络各国，但因经费困难，并未成行^[6]。由此可见当时孙中山将中德联盟视为欧亚大陆和平稳定的基础因素之一。

孙中山在旅居欧洲时期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过德国的历史经验，并曾数次访问过德国。在他的眼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府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他赞赏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并“通过不断增强的支持与社会福利的增加”来巩固国家的手段^[7]。他把德国的经验融汇到他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的理论之中，希望吸收德国在社会改良与发展方面的经验，“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缓和工人的贫困”。孙中山进一步发挥说“俾斯麦实行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生主义”^[8]。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对于北京政府对德断交及宣战之举，孙中山持着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当时中国对德并非必须宣战不可，段祺瑞以德国实行潜艇封锁政策使我赴法劳工所乘之轮遭袭遇害，从而对德宣战，但“独募华工往，及其船沉，华人则任其溺死，岂非英法人设讹，引我国人人其术中而致之死地乎？”^[9]何况不久德国一轮在南洋为协约国击沉，船上华工80余人同时遭难，而段政府对此却为何一言不发？孙中山在分析列强对华危害时曾说过：“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则中国已割黑龙江沿岸最丰饶之地于俄，割缅甸、香港于英，……法占广州湾，俄占旅顺、大连，又转让之于日。论其前事，德之胶州，罪无以加于他国，而今者胶州已归日占，再无德人危我领土之虞。”他指斥北京政府“侵我较多者则助之，侵我较少者则攻之，是与其谓为防人侵我领土而战，不若为劝人侵我领土而战也。如欲使人侵我领土，则毋宁倡言卖国之为愈也，又何必辛苦艰难以与德国战哉！”^[10]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段政府之“与德绝交，非以公道绝交，非以防卫绝交，而以贿赂之也”^[11]。他对这种“视国事如同儿戏”之举进行了坚决斗争。孙中山致电北京参众两院“主张勿加入协约”，并致电“英相盼勿怂恿中国参入协约”，同时还致电北京“民友会”、“同政学会”及“政余俱乐部”等相关团体，吁请抵制对德宣战案。最后，他径电段祺瑞，“痛陈参战之利害，而劝其勿轻率从事”^[12]。他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国与德奥乃至各列强间存在的一切问题。

当时孙中山对中德关系有如下之认识：“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惜乎国人……徒以德国大战失败，为不足齿列，而不知其因有之人才与学问，皆资足助吾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也。”^[13]德国不但在科技知识上有卓越的表现，即其建国之经验也多可为我所借鉴，“中山先生很景仰当时德国所采行的社会福利、劳工保险、解决劳资对立以及防止资本主义过分膨胀等政策，民生主义也采取了其中若干精神，尤以计划将交通（铁路）、邮电以